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十四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说 明

根据政治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我院及军队院校中国现代史、革命史、党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的教学以及研究生班的需要，我们对本室一九七九年编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11册）作了增补，将近年来党史研究中发掘和收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史料，续编七册（序号12—18）：党的创立时期（12）；一战时期一册（13）；二战时期二册（14、15）；抗战时期二册（16、17）；三战时期一册（18）。同时，编印社会主义时期资料十四册（19—32）。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为保持文件原貌，所有资料均未作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曲延绩、张天荣、肖牲、胡庆云、林蕴晖、何礼、李兴仁、丛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责整个资料的选编。由赵更群、魏政、李浚负责印制出版。刘星星参加了资料的汇集、整理工作。

第14册由林蕴晖选编，林蕴晖、李浚统编。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	(1)
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1927年9月19日)	(13)
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0月1日)	(14)
职工运动决议案——扩大会议决议(1927年11月)	(15)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1927年11月)	(21)
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 (1927年11月18日)	(25)
中央复陈独秀函——关于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问题(1927年12月9日)	(28)
〔附〕陈独秀来信(1927年11月12日)	(30)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1927年9月15日)	(31)
中共中央最近政治状况报告(1927年10月)	(35)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8年2月10日)	(40)
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关于组织工作(1928年1月30日)	(46)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年3月10日)	(50)
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1928年3月10日)	(54)
中央通告第四十六号——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态度(1928年5月11日)	(58)
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 (1928年5月18日)	(60)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1928年5月25日)	(64)
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 复兴城市工作问题(1928年6月21日)	(71)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军事报告(1928年7月3日)	(76)
中央致江西省委信——根据地与红军问题(1928年8月)	(89)
目前革命形势的分析与党的战术战略(1928年10月4日)	(91)
中央通告第六十九号——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1928年10月17日)	(96)
中央通告第七十四号——关于军事问题(1928年10月25日)	(103)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28年11月28日)	(105)
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一)(1929年2月3日)	(109)
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1929年6月)	(111)

军部工作报告（1929年6月19日）	（ 121 ）
二中全会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1929年6月）	（ 123 ）
宣传工作决议案（1929年6月）	（ 126 ）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1929年7月5日）	（ 137 ）
中央通告第四十一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	
（1929年7月17日）	（ 141 ）
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1929年8月13日）	（ 143 ）
中央军事部关于目前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29年10月17日）	（ 146 ）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诸同志的信（1929年11月2日）	（ 149 ）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驻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信（1929年11月22日）	（ 153 ）
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1929年12月）	（ 162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工作的决议（1929年）	（ 168 ）
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接受国际对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	
（1929年12月14日）	（ 171 ）
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1929年12月20日）	（ 178 ）
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0年1月11日）	（ 182 ）
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目前政治形势与朱毛红军发展情况	
（1928年4月25日）	（ 188 ）
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4日）	（ 190 ）
湖南省委对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1928年6月19日）	（ 198 ）
湖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	（ 201 ）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目前湖南工作给湘赣边特委的补充指示（1928年7月20日）	（ 203 ）
团湘南特委徐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6月）	（ 205 ）
湘赣边特委致省委信（1928年8月）	（ 208 ）
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目前应采取的路线给润之、湘赣边特委	
及四军军长的指示（1928年10月）	（ 209 ）
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 219 ）
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	（ 221 ）
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岩委及红四军前委信——闽粤赣三省反动军阀	
会剿的形势和我们的斗争策略（1929年8月8日）	（ 225 ）
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关于闽西党的工作任务	
（1929年10月6日）	（ 229 ）

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关于开往潮梅一带游击情况的报告（1929年10月18日）	（ 234 ）
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11月28日）	（ 235 ）
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6日）	（ 236 ）
中央关于红四军问题给广东省委指示信（1930年2月1日）	（ 238 ）
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年7月——1930年4月）	（ 239 ）
江西军事工作报告（1929年5月4日）	（ 263 ）
前委赣西特委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告（1930年2月14日）	（ 268 ）
刘士奇给曾觉非同志信——党内斗争与开除江汉波的党籍（1930年2月28日）	（ 271 ）
〔附〕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年4月4日）	（ 273 ）
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一号（1930年4月9日）	（ 275 ）
江西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布告（1930年）	（ 278 ）
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	（ 280 ）
中共福建省委报告——闽西最近情况及省委对闽西斗争的估量与指示 （1929年4月20日）	（ 294 ）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会议情形（1929年7月）	（ 299 ）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27日）	（ 301 ）
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1930年3月25日）	（ 305 ）
红五军之任务与工作方针（1928年10月12日）	（ 306 ）
湘赣边特委信（1929年3月17日）	（ 308 ）
湘赣边界工作报告（1929年5—8月）	（ 312 ）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1929年10月）	（ 320 ）
湘鄂赣边特委王首道给湘委并转中央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第四号 （1929年12月2日）	（ 330 ）
五军军委滕代远报告（1930年4月27日）	（ 349 ）
湘西北特委施元关于特委工作、暴动经过等向中央的报告（1928年3月13日）	（ 360 ）
中央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之指示信（1928年10月4日）	（ 363 ）
湘鄂西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3月8日）	（ 365 ）
鄂西特委代表大会关于军事问题决议案（1929年12月）	（ 370 ）
中共中央给新编一师诸同志的信（1929年10月12日）	（ 374 ）
中央关于鄂豫皖特委与红一军的成立三个文件（1930年2月——3月）	（ 379 ）
中共中央给鄂豫皖边特并转红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师委及全体同志信 （1930年3月18日）	（ 384 ）
关于鄂豫边情况的综合报告（1930年）	（ 389 ）

七军前委报告(1929年)	(393)
右江苏维埃政府土地法暂行条例(1930年5月1日)	(399)
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1930年2月26日)	(402)
中央给三军前委信(1930年3月10日)	(406)
中央军事部讨论江西军事工作布置的结论(1930年3月15日)	(410)
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	(413)
中央关于目前迫切任务与策略路线等问题给鄂豫皖边特的指示 (1930年3月22日)	(418)
中央给四军前委指示信——关于党和红军的总任务及策略路线 (1930年4月3日)	(424)
中央通知第一〇三号——关于全国红军指挥问题(1930年4月3日)	(426)
中央为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给湖北省委的指示(1930年4月12日)	(427)
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	(432)
中央给七军前委的信(1930年4月20日)	(439)
中共中央给四军前委并转三、四、五军总前委的信(1930年4月24日)	(441)
中央给福建省委转闽西特委指示信——关于红十二军任务及发展路线 (1930年4月28日)	(442)
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9日)	(443)
柏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 (1930年6月9日)	(445)
中央致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450)
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1930年6月24日)	(452)
中央长江办事处给第五第八两军前委的信(1930年7月)	(460)
柏山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 (1930年7月13日)	(463)
长江办事处给中央军委的信(1930年7月17日)	(467)
红色区域最高的军事政治指导机关(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产生与运用 (1930年7月21日)	(470)
中央临时政治局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全国工作布置(1930年8月3日)	(471)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1930年8月5日)	(478)
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年8月10日)	(479)
中共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占领长沙的 战略与政策的指示(1930年8月29日)	(480)
军事情形与兵暴工作(1930年9月7日)	(484)
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国际电 (1930年9月8日)	(486)

关于加强红军中干部问题（1930年9月9日）	（ 487 ）
关于五军经过和赣西湘东赣北鄂南等地工农革命的情形（1930年7月13日）	（ 488 ）
五军军委书记滕代远向中央军委的报告（1930年7月13日）	（ 494 ）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的两封信（1930年8月）	（ 496 ）
彭德怀给中央的报告和鄂东南特委的信（1930年10月9日）	（ 498 ）
一方面军总前委来信（1930年10月19日）	（ 503 ）
告商人书（1930年10月）	（ 504 ）
邓中夏关于二军团行动、扩大苏区及湘鄂西特委组织问题的报告 （1930年9月31日）	（ 506 ）
邓中夏关于红二、六军的报告（1930年10月19日）	（ 509 ）
红一军前委关于编组独立第四师及其行动方向等给长江局的报告 （1930年11月7日）	（ 512 ）
目前政治形势和右江党的策略——红七军前委通告（第六号） （1930年9月9日）	（ 514 ）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引言 （1930年10月6日）	（ 517 ）
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1930年9月）	特生（ 519 ）
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1930年9月24日）	恩来（ 522 ）
柏山在六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1930年9月）	（ 535 ）
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三全扩大会的总结与精神（1930年10月12日）	（ 540 ）
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1930年11月25日）	（ 546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同志书——为反对和肃清立三同志路线的问题 （1930年12月）	（ 548 ）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1930年12月）	（ 556 ）
中央关于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及红一军、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的指示 （1930年10月18日）	（ 586 ）
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两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 （1930年10月29日）	（ 591 ）
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中共长江局军事办事处（1930年11月28日）	（ 594 ）
中央给红军的训令（1930年12月10日）	（ 596 ）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1月）	（ 604 ）
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1930年12月9日）	（ 619 ）
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 （1931年1月15日）	（ 620 ）

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通令第六号（1931年2月17日）.....（623）

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1930年6月25日）.....（624）

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1930年9月24日）.....（627）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634）

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1月16日）.....（638）

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3月28日）.....（643）

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节录）（1931年9月20日）.....（646）

〔附〕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决议案之二——党对政治斗争问题决议案
（1930年8月27日）.....（649）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到*：中央委员：迈、秋、大、中、	
弼、兆、顺、亦、乔、和	10
侯补委员：震、沉、泽	3
监察委员：鲍、荷	2
C·Y·代表：芬、善、定	3
湘代表：达	1
鄂代表：超	1
军委代表：飞	1
	共21

国际代表及其他二俄同志
迈主席

* 据考证，到会者为：

中央委员：罗迈（即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侯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监察委员：杨鲍安、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彭公达。

湖北代表：邓超麟。

军委代表：王一飞。

中央秘书：邓小平。

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及牛曼，洛蜀莫娃。

迈：宣布开会：在七月四日（十二？）^①以后国民党政府背叛以前常委之组成为，特恩立迈大^②五人，后特、恩、立到前方，现留的仅迈、大二人。在国际代表未来以前，国际曾有一训令，对中央提出许多错误，指明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并要中党开一紧急会议，指出此倾向并改组中央。后国际代表到，对此亦谈很多，并决定召集紧急会议。此会议原定七月廿八开，后因种种关系不果，直至今日才实现。今天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不过半数。此会议是一紧急会议，议程有三：

注：① 原记为七月十三，又改为四日。经考证，肯定不是四日，应在六日到十二日之间。

② 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

1、国际代表报告——指出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

2、常委代表报告——将来工作方针，过去我们与国际代表对于各种问题讨论得很多，并已提出草案。常委报告人已推定秋白。

3、改组中央政治局。

今天的会只能开一天，发言请扼要。

（一）国际代表报告，并讨论此报告。

在未开始报告之先，我以国际名义向大家致一敬礼。此敬礼非平常的敬礼。国际要中国共产党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将不成其为C.P.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已经很深了，非召集此会不可。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党的指导与国际的指导及群众要求差得如此之远，是非常奇怪的。

在国际中央看到的在现在中国环境中召集此会是非常困难而且是非常困难的。假使反动的国民政府知道我们在此开会，必定要将我们一网打尽的。但因非召集此会不能改正过去的错误，所以仍坚决的召集一些与群众比较接近的领导者来开此会。我们要指出过去的错误，并须使此错误为大家所认识。因为过去不但中央的指导者错误而且各地方的指导者也错误。所以如果不将此错误使大家都知道都认识，仅有几个领袖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

国际中央决议认为，此次紧急会议不仅是讨论过去错误，还应实行改组指导机关，现在的问题，是否此会有改组指导机关（中央）的权力。因为中央与各地的隔离，今天的会仅有两个地方的代表参加。但因现处于秘密环境中，故可以叫以〔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此临时中央政治局有权通告全党，指出过去的错误及将来方针，并有权可以召集代表大会代临时代表大会。①

此临时中央政治局要得到国际的同意后，方能正式成立。

在今天的会议中我们要估计过去的工作。关于此点，常委已提出一个很详细的告同志书，同时又因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报告中，只能指出重要的错误。

在未批评之先，我们要指出的是：如果党过去的指导是照多数主义及国际决议做去的，则现在的情势决不如此。这并非看过去主观的力量而是客观的事实。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少、经验小，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其他任何阶级却都不能及他的力量之大。中国资产阶级是非常薄弱的，如无国际资本的帮助，则他久已倒了。中国的资本多在外人手中，外国资本组织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故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小。至于农民、小资产阶级虽多，但事实上已证明了他们不能领导革命。这般农民、小资产阶级不是跟着无产阶级走便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在现在的阶级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是以阶级的力量来反对中外资产阶级了，其他任何阶级都不及他有力量。

目前中国已进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可以引中国革命到另一新的阶段，虽然，我们仍要指出中国农民仍不能有独立的阶级的政策，他不跟无产阶级走即跟资产阶级走。中国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中他是革命的，现在已经反动了。只有无产阶级能领导农民，农民也只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求得自身之解放。中国共产党两年来领导无产阶级已有许多斗争的经验，如果中央能有〔够〕正确的不动摇的来领导无产阶级，则中国阶级间的关系一定不

注：①原文如此。

是现在这样的局面：不仅武汉即其他地方亦不会有此反动的局面。

要考察过去党的指导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四月一直到七月底党的指导都是照着改良主义去决定他的策略。他不但对小资产阶级即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也有很大的让步，对国民党的让步，甚至失掉了我们党自己的独立性。到现在他们要赶跑我们了，在街上杀戮我们了。我们的党为要阻止农民的运动，结果使农民运动遭了大的摧残，农民群众遭了大的屠杀。我们的党为要使工人让步，结果使工人运动大大失败。一直让步到党不能公开的成立。直到八月初南昌事变起，于是才开始有一坚决的转机，如此，我们可以断定以后的情形一定与过去不同了，这是因为我们能坚决照革命路线上走。此次事变，我们多少有点武器。因此，我们如果实行坚决的革命策略，现时的环境一定与从前不同。

拿中央的理论及实际来看，他简直是少数派的，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党，这是我们根据中国党决定各种问题而得到的结论。中国少数主义的基础是没有的，因为少数主义是建筑在工人贵族的基础上。如照中国〔党〕中央的路线上走则可说无C.P.了。好在中国工人阶级无工人贵族的基础，故无此危机，这从上海广东湖北的争斗我们可以看出，从武汉工人革命性之充分可以看出。他们的行为要不是照中央的指示而是自然的表现。好在中国党中央尚无集权的指导群众的力量，这实是过去的幸事。如此会是随便召集的，或群众与指导机关的意识是一样的，那召集此会为无意义。正因为群众与中央的指导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希望很快的得到党的指导之错误改换过来。

在那封信里（告同志书）指出之主要的有中国革命之性质及在革命中各个阶级的作用。这种作在^①过去中央的认识可说是纯粹的少数主义的。他认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战线中必然要有资产阶级，不知资产阶级当工人运动发展的时候必然退出此战线，这是在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明明白白指出的。现在有两路：一是仍然维持此民族统一战线而反工农利益；一是为工农利益而反此民族统一战线，这两条路线我们要来找。我们应很坚决的不仅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余孽，并且还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中央过去造出一些少数派的理论：以为阶级争斗与国民革命是冲突的，这我们根据上月中央给上海党部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此信中说要扩大反帝国主义运动，可以不需要坚决的阶级斗争，并应号召第二次“五卅”。这无异乎是要拿工人去牺牲。实则工运愈发展打击资产阶级愈利害，阶级斗争愈剧烈，也就愈能打击帝国主义。

关于此问题不但对于过去即对于将来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我们要问：以后是否还应维持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中国资产阶级总想戴些假面具，蒋介石一面与日美勾结，一面又要做反日运动。现在武汉政府现尚未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虽然我们明知他将来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是否应帮助武汉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其实，如果C.P.党员来帮助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则C.P.党员的身份必失去。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在经济上虽有问题，但在政治上是一致的。现在他们虽与帝国主义有纠纷，但此纠纷是逐渐减少的。他们怕工人阶级比怕帝国主义厉害得多。他们不惜如何与帝国主义妥协来压迫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不应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在利用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来揭破他们的阴谋，来达到反资产阶级的目的。我们须知道，只有资产阶级打倒后帝国主义才能打倒。

民族解放斗争还要继续下去，此重担仍是无产阶级担负。“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

注：①原文如此。

界”等口号仍要存在，这些口号也是用来反资产阶级的。

过去党的策略是反工农的是可耻的。比如说中央不要工人运动有过分的要求而要为反帝国主义来牺牲，并要与国民党组织强迫仲裁来制止罢工。对农民运动的策略也可说是变节的，在湖南的运动的指导可说是改良的。

现在又说关于国民党的策略问题。国民党与其他政党不同的地方是他是多阶级的联合。蒋介石四月以前的国民党的指导作用是在资产阶级手中。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指导，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都赶出去。此任务在国民党下层的同志都实现了，但中央的策略却不能巩固此任务，将我们独立的政策及批评国民党的权限取消。比如联席会议中的决议说：联席会议的决议不能以联席会议名义公布，只能经过国民党公布。又比如说：民族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并且还有教我们在报馆中的同志不要根据我们主义来作文章的事实。甚而至于工农运动也要国民党来做。这是非常错误的方法。在联合战线中我们应有独立存在及坚决的批的自由。中央的主张恰与此相反。湖南则不同他能用联席会议的名义公布决议案。列宁说：如果在联合战线中不能独立的存在不能有批评的自由，则等于出卖阶级的利益。过去我们仅依靠与国民党几个上层的领袖的联合，这实在是一很好的方法，但是一个取消本党甚至国民党的好法子。

在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有些同志说：要与国民党联合，必不能很自由的革命。好了，现在南昌独立了我们可以独立的自由的革命了。这个结论也是同样错误的，主张退出国民党的有俄国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中的谭平山也要组织第三党来消灭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谓第三党即是少数党。甚而独秀同志也说：如果留在国民党则不能有充分的表示；要有充分的表示则必退出国民党。这些都是非常不对的，至少现时不对。

南昌这次政策是对的。我们的政策不要依靠到几个国民党的领袖上，而要依靠到国民党的群众上面。现在不应退出国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要在国民革命成功社会革命时才能提出。现既有一新的联合，我们有了过去的经验，我们要坚决的批评。只有照革命的路线不怕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然后才能巩固革命。

再讲一讲中国党中央对国际的关系和错误的责任问题。有些同志说这些错误国际方面应当负责任的。关于这方面，我们要问一问国际有无一指令与现在的方向不同的。无论关于那一方面我都可以坚决的声明：国际无一天不打算将中国党的路线引上正轨的。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中央未将国际的指导达到群众中去，比如第八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主要决议案尚未译出，许多中央委员还不知道。即第七次大会的决议都未传达到群众中去讨论。中央委员即知道了也不过仅口头上的承认，甚至不接受。所以国际要唤起其所有的各国支部及中国全体党员来批评错误。国际有时自然也是有错误的，但我们相信他有许多争斗的经验，我们应诚意接受他的指令，不然必遭失败。过去在西欧的党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国际有许多的经验，我们应当相信，接受他的指导，不然我们将会走到非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

至于过去错误的责任问题，中央的领袖独秀同志有许多问题虽然决议后，他仍要以个人的意思来改变此决议。但此责任应政治局大家来负。比如对工农下层领袖的说话以为不足听，所以指导党的工农分子是很少的。因此党发生许多奇怪的理论。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的正确。

以后我们党的指导要集体化，不要族长化。党的问题要使群众知道。现在一定有人以为他自己是在党之上的，或者他要非难我们今天选出的临时政治局。我们对此应用党的纪律与之实行坚决的斗争，然后党的指导才能巩固起来。至于其他问题因时间关系不能多说。

〔迈〕^①：国际代表的报告已完，他报告中包括几个重要问题：1.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2.工人问题。3.农民问题。4.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5.对国际的关系问题。此报告常委已经接受。现在各同志可以发言，但要简单。

（休息半小时食饮食）

东：国际代表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去，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象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甚可怪的，唐军还仅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中：国际代表起草的信和今日的报告完全是对的。过去也有许多同志感觉到中央的指导不好，现在再拿事实〔去〕看更见明确。机会主义发生不自今日始，已由〔早〕有由来。为什么现在才表现出来呢？这是因为阶级斗争加剧的关系。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大家在理论上亦颇认识，但在实行上却大不同了，误解了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的理论。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中有两点：1.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2.土地革命，使同志发生问题。大家对这两点未认清。以前我们将小资产阶级看得太低，第五次大会又把小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甚至将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等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这样还说什么土地革命呢？！中央对国际决议并未了解，以致将小资产阶级看得比土地革命更重。我们的党自从成立一直到现在可说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其中还夹着有些封建关系，和政客概念。每对一问题总是喜欢用

注：①原件脱漏，经考证，应为“迈”字。

手腕，利用某来打某，并非由于阶级出发点来决定一切问题。同时我们党的书生气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产业工人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工作说了好几年了，但未实行，大家总以为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看开口数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要高百倍。荷波是个工人，他虽现已近乎知识分子化了，但他仍未脱离工人的意识。他曾对我说了好几次：他以为现在用不着这样看重小资产阶级，只要我们有力量，小资产阶级自然要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过去失掉了好多机会，所以我对国际代表的报告是完全同意的。

和：完全同意国际代表的报告及国际决议。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直到现在，此错误我们实不能宽恕。现在已经很显然的是机会主义，我们现在不能仍然说国际也有错误，应由政治局负担，不然便是文饰自己的错误。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人，我应负此错误的责任。五次大会后的错误主要的是未实行五次大会的决议：1.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成立了很好的决议，但大会后中央不实行而且相反。2.五次大会以前的失败完全由于退守，南京如此广东亦如此，五次大会即指明此点，但大会后仍照此方针。第一个决议即是要向小资产阶级让步，所以完全受了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反对一切“过火”的运动。当时政治局以为小资产阶级动摇，我们孤立了，实则农民已经跟我们来，我们何尝孤立。小资产阶级是全体的动摇吗？还是几个上层的领袖呢？政治局没有看清楚，所以当时政局的呼声便是要对小资产阶级让步。3.素来党的指导即未建筑在群众方面，以致中央完全成了普通的政治团体，非阶级的指导直到以后，政治局的指导简直与国民党一样，并且还以小资产阶级几个上层领袖的意识为转移。这当然，不是国际的错误。我们应承认过去的错误。现在的问题是改正过去的错误。自国际训令来，党的上层有一个恐慌，以为这样旧的指导人必完全去掉，必有组织上的恐慌，这并不是群众的忧虑而是上层的忧虑，我以为这是不足恐慌的。因为要改变党的指导必换新的指导人不可，过去党的家长制到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政党只要有政治的路线组织上则不成问题，我们应将此点向群众解释。最后，我说的是：过去的党的错误未达到群众中去，这次的错误要传达到群众中去，使群众都认识此错误，然后党才能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权。

达：完全同意国际代表的报告。1.过去中央完全是一个和平的，不革命的党，不是一个争斗的党。乡村农民已经起来夺取政权了，党反而阻挡，党对农民运动完全与顾孟余一样的见解。党以为农民暴动是原始的，这是逃避群众的争斗，完全走到不革命反革命的路上去。2.国际是无错误的错的责任全在政治局。政治局完全带着国民党几个领袖的意识来成立党的决议，五次大会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决议政治局完全抛弃了。3.过去党的指导不好有绅士的气概。过去曾有群众忿怒欲杀上层同志的事实，如湖南有许多同志要杀夏 牺〔曦〕，把夏 牺〔曦〕也当一个劣绅看待。党对这些现象不能解决，只能当书生坐在屋中决定策略。

亦：中央对于各种运动无一坚定的策略。我时常有这样一个感觉：中国共产党无一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我意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出发于此。第五次大会以前党对大资产阶级估量太高，大会时对小资产阶级估量得太多，所以对国民党看得太高。党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这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我看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作客者不是革命的主人。中国共产党需要有不郎基主义的精神，在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工作。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的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

非常之坏。既认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魏金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魏金斯基在1917年以后才加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动时他要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也知道是国际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听说这次国际代表很有革命的经验，我们自然满意，并希望国际代表能将此点转告国际。此外我还有一点意见，在告同志书中应加一点：指出过去党是不能争斗的这是在组织上的错误。还有一问题，即是党的指导的问题。五次大会时还是一些元老来指导这是大错的。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来作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来作领导这是很对的。

弼：接受国际代表的报告及国际决议。1、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这完全是事实，其原因是我们尽尽〔仅仅〕作了上层的工作而忽视〔视〕了要以革命的力量来领导小资产阶级，比如五次大会后第一问题是北伐问题，国际代表ROy〔罗易，下同〕主张深入，鲍罗庭主扩大，结果深入扩大并进。武汉政府的封建势力为要扩张其势力是需要北伐的，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北伐但要借此机会来抓住群众。结果不然，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北伐结果，唐等势力更大，其影响汪等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2、土地革命问题。在国际电报告说C.P.与C.Y.意见冲突，主要的就是土地革命问题。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并造出一个理论说，土地革命是很长很远的过程，不知这是目前的行动纲领。党不但无土地革命决心，并且还有与国民党组织土地委员会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党无土地革命的决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于新时期。3、党怕群众，如对学生代表大会不召集是因为孙科反对。劳动大会如此，工纠之解散也是如此。因此党处处牵〔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4、关于组织问题。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作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

芬：1、过去党的错误问题。党的指导的意识不是建筑在阶级及群众之上的。五次大会是群众意识之表现，成立了许多正确的决议。但五次大会后，党不发展群众运动。但群众运动仍然发展上去，党连尾巴都跟不上了。特立^①说：土地革命无法做，如做，则不但国民党反对，即党内的群众也必有三分之二反对，这是非常错误的说法。2、第二农民问题，秋收暴动问题，同志有以为要秋收暴动则须解决武装问题，忘记了农民武装要在农民暴动过程中来创造。我们也不是定要在此暴动来得到政权，而是要以此暴动提高乡村中的争斗。3 过党对青年问题，党的指导机关忽视了，五次大会独秀对C.Y.说了许多消极的话，他对C.Y.并且有家长的态度表现出来。以后应积极的指导C.Y.工作。

秋：以为草案中应加增几点：1、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中对小资产阶级态度说得不详细。应加说明党过去只看见上面的小资产阶级领袖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如前之态度。2、中央政策与国际政策中加说我们党团太无作用。3、对国民党内应加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并攻击平山的第三党的主张。4、C.P.对于政权的性质为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的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这几点已与国际代表商议，现在只是文字的修改。

和：还加一点，关于土地革命的解释。老鲍的解释与国际的解释不同。中央政治局过去渐渐采取了老鲍的意见，现应加入说明此点。

①：即张国燾。

迈：国际代表提议停止讨论。我意：1、过去党的指导错误问题大家同意；2、指导机关改选大家也是同意。所以可以停止讨论，由国际代表作结论。

D：大家都同意，结论自无甚说的。亦，和说：鲍罗庭，罗易，魏金斯基之错误，鲍的理论自然是错的，土地革命不是能在学校中可以训练得出来的。谁也不敢担保没有错误，我也许将来有错误的。不管罗魏等的路线如何，总比我们中央有错不改要好些。不管国际代表有无错误，主要的还是中共中央机关之健全。只要我们是革命的机关，纵然国际代表有错也是不十分严重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能实行国际的指导。

至于指导成份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作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从事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新政治局提出正式七人，候补五人。

至目前状况的估计：现在又是一种情形：农工都遭了摧残，反动势力高涨，革命遭了一严重的打击和损失，但革命并未停止。现在仍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革命，但由民权革命的发展中而发展的阶级冲突仍未消灭。

民族革命中有五矛盾：1、上面说过我们仍要反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此第一矛盾仍然存在；2、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土地革命便是解决此矛盾之最好的方法；3、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之改良仍未实行，因此，必然要号召工人反对资产阶级；4、工农城市贫民必然起来反抗一切压迫夺取政权；5、统一中国现在不但未做到，而且更加分裂了。所有德谟克拉西的五个任务我们未实现一个。现在的问题是革命的浪潮何时爆发？反动势力能维持到何时？这只有在革命中才可看出。现在我们的党尽力号召坚决的斗争。我们先要有一正确的策略然后才能作此争斗。如还有人主张第三党，我们要很坚决的处以党的纪律。

最后关于告同志书提议在原则上付一表决，文字上则可推出三人组织一小委员会去修改。

迈：照国际代表提议付表决：

决：

1、全体通过在原则上同意告同志书的草案。

2、以秋、迈、兆三人组织委员会修改文字。

（二）秋报告

在未报告之先我要说两点：1、在中国革命中中国资产阶级是否与封建阶级斗争？我们要知道此是一重要问题。蒋介石等拿着政权不但得帝国主义帮助，还得封建阶级的帮助。可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无大冲突的。说明了此点，可以去掉以为中国革命分两阶段的幻想。此幻想可以容许我们党外合作，实则此幻想是错误的，中国资产阶级一点民权性也没有。现在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消灭两条路。2、革命的指导机关犯了绅士的毛病。我们的党缺乏平民的精神。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的。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中曾有同国民党提出条件退出国民党的倾向。过去当我们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又不允许我们包办，现在想包办又不可能了。过去我们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过去也是有效的，但现在已经不适宜了。七

月十三日我党的宣言是党的新政策之开始，中央政治局与国民党反脸的宣言的内容是很坚决的。汪之反脸，其主因不是ROY给电报他看，ROY给电报与汪看自然是错误的，给了汪以反脸的口实。在汪接到冯不反蒋的电报时非常震怒，于是他更加力宣传反蒋。唐等于是以反共挟之，在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汪表示被人强奸，并表示不能在武汉立足。恰好，此时得到了ROY给他的电报，得到了新的出路，于是将此电报来作为他反脸投降唐等的工具，于是公然主张反共。此后，汪的主要敌人便是张发奎部下的共产分子了。张此时亦有点动摇，曾有叶暂时退出C.P.的要求，我们党内当时也有人有此感觉但结果并未成为事实。同时孙邓宣言之发出，所以我们党的宣言比较坚决。这次南昌的行动，至少是无意识的走到新的方针。七月十五以前，我们参加政府还有由上面来帮助发展下层工作的条件，现已全国反动，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

叶贺发动以后，张非常慌张和震怒，于是马上带了几百卫队坐火车去阻挡自己的部队。他自以为是为党工作，所有的旧部仍应归其指挥。结果自己身边的一枝枪都被交去，这也许是客气了一点。张第二次的讨伐命令是非常软弱的，是相机发展。由此可知张已无进攻之能力。朱培德的力量亦很薄弱，两师皆不能作战。今日报载我们已离开南昌，据我推测这一定是前方胜利了。从前中央有一命令去前委，大概他们已照此命令进行。现在我们的主要敌军是35、36两军，但唐决不肯用此力量来为张出力而要用来夺取江苏的。第三派势力在此次事变前已有酝酿，由白崇禧李宗仁〔仁〕担保南京和平，朱培德担保武汉，以汪为领袖，并由白李要蒋下野。第三派与唐有冲突，但现不会马上爆〔暴〕露，因尚要共同反共产军。

将来的局面与以前不同，以前有大的领袖，如奉张，宁蒋，吴佩孚等，以后则分为许多小军阀。进到很温〔紊〕乱的时期。这证明封建阶级之倒台，资产阶级之软弱。这一堆反革命的冲突非常利害的，这是革命前途之一优点，因为他们内部极不稳定。

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叶挺已如此，在相当时期，北方之张兆丰也应如此。这是一定有胜利的机会的。

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1.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戴了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汪便是此派之代表。所以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是汪。列宁过去也非常注意打消〔击〕这种人。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策略。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2.我们要纠正过去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谁赞成我们，就是左派。3.现在的目的，并不是与政府绝缘，我们对政府有三个阶段：a不参加政府；b参加政府，但发生许多错误，失掉了参加政府的作用；c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但我们要占多数，成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乡村中要农会政权。我们要坚决的干，我们要告诉群众，武汉南京北京政府都是反革命的。打倒汪精卫是不容①的。我们必须努力做，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针。

因各种要求，常委及国际代表起草了三种决议，提出今天讨论。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问题1.如何做国民党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我们已发表了一个告国民党同志书，此书应为左派政纲。2.军队中及兵士中工作，现在也很重要，我已与一飞商议要作此工作，临时政治局应注

注：①原文如此。